《日本诗史》中的“我邦”意识还表现在对人名、地名的命名规定上。凡例中提到：

“我邦多复姓，操觚之士，或以为不雅驯，于是往往减为单姓，不翅代北九十九姓，其义得失，姑置之。是编多完录姓氏，要使后人易捡索而亦不尽然者，又说也。余已载诸《授业编》，因不复赘。地名亦然，远江州称袁州，美浓州称襄阳，金泽为金陵，广岛为广陵之类，于义有害，是以一槩不书。”

日本人复姓改为单姓，有的是出于对典雅文辞的考虑。例如上文提到的平安时代的贵族庆滋保胤，就在《江谈钞》中被称为“庆保胤”；同时期的贵族大江以言则在其中被称为“江以言”（17）。《江谈钞》是一部说话集，其记录了当时中纳言大江匡房的谈话，反映出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不同侧面，因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风气。从“是编多完录姓氏”的做法可以看出，江村北海是倾向保留原来的复姓的。只是由于改为单姓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风俗，所以在此，北海对人名改动所造成的影响采取悬置的态度。

而在这段话中，针对时人用中国的地名取代日本令制国名的做法，江村北海的反对态度是很坚决的。《日本诗史》卷五所涉及到的令制国，以京都和江户为端点，主要集中在东海道区域；余下的令制国，最西端在山阳道的备后国，最南端是南海道的阿波国，最北端位于东山道的陆奥国，最东则延伸到常陆国。

而有关这些令制国的地理位置、风土人情的知识，有的是江村北海从别人那里听说的，比如陆奥国：“陆奥大国，大小藩府，无虑二十，而仙台为大。余闻藩中以儒业世禄者，有数十人。而其文藻无所闻见。”（52）但更多的是他从亲身的见闻中得出的，如在越中国的游历：“客岁之春，佐伯季雘游京数，过余家。闻余好山水，盛说立山奇绝，遂以秋九月，余游富山，并五十日。”（53）又如其与各地好诗者的交往：“然客岁余游越中，高山人某，因富山渡边公庸，请诗于余。斯知其土人。”；“备中文艺，余未考之。近惣社邑人，藤野如水，游京师，数过余家。为人短小黑瘦，口讷讷焉。见之，如无才者。会晤再三，渐测其所蕴，殊为该博。”（56）

从以上来看，《日本诗史》中充满了对京畿、江户以外的地方的关心。